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

郑师渠——著



人民出版社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

郑师渠 著

责任编辑：贺 畅 詹 夺

责任校对：吴容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郑师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046-0

I. ①近… II. ①郑…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2382 号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

JINDAI ZHISHI JIEJI XINLUN

郑师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25

字数:462 千字

ISBN 978-7-01-020046-0 定价:1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近代知识阶级形成于五四前后。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废科举是知识阶级在近代由社会中心走向了边缘化的重要表征。这并不准确。事实上，知识阶级从未离开过社会的中心地位。晚清废科举只是传统士大夫阶级作为整体宣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表征；而近代知识阶级代之而起，甫登历史舞台，即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故李大钊说：“新文化运动是知识阶级的胜利”。在随后壮怀激烈的五卅运动与三一八运动中，它同样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中坚角色。这分明是“王者归来”的气度，哪里有丝毫被边缘化的痕迹！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即由注重新文化问题，转向了主张政治革命，国共领导的国民大革命缘此洪波涌起。与此相应，如何确定身处其间新生知识阶级的社会角色，便为各方所关注。梁启超说，五四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民的”“国民运动”时代。“运动主体要多方面”，“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但若专靠知识阶级做主体，却反于国民运动的精神了”。其命意在于尊民众。至于恽代英强调：“我们反对‘士大夫救国论’，相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则是明显否定了知识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其自我体认却甚高，声言是“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即以中国社会精神领袖自居。这远非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知识阶级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彰显了自己源于阶级属性的个性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此双重性格，不仅预示了近代知识阶级蕴含内在的张力，此种张力在助益国共领导的国民大革命的同时，也为其自身增添了丰富性；而且，还决定了在此后的整个近代史上，知识阶级的得失毁誉和最终的归宿。当然，也唯其如此，聚焦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知识阶级研究，将助益于进一步理解

与把握其后近代知识阶级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文集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的 11 篇文章，多为长篇专题研究，广泛涉及了诸如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反省现代性的不同视角；中共建立的“思想联合战线”与思想界关于“好政府主义”与“科玄之争”两场著名的论战，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南京民国政府建立初期的政治心态，等等的问题。中篇多为学术短评与时代随想，例如：《学术与时代：新中国史学断想》《历史转型期的改革风险》《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 30 年”》，等等。其中，《缅怀导师龚书铎教授》是龚先生去世后为先生纪念集撰写的怀念之作。下篇则多是为弟子们博士论文出版写的部分序言。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同时，人民出版社的贺畅、詹夺同志为编辑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一并深表谢忱。

2018 年 5 月 1 日

于京师园

目 录

上 编

梁启超与欧战·····	3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20
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45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93
“五四”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	
——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43
从“五卅”到“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	
——以北京、上海为中心·····	173
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	
两场论争（1922—1924）·····	204
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	23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1927—1932）··	263
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	294
近代中国文化三题·····	304

中 编

学术与时代：新中国史学断想·····	323
广义的“五四精神”不仅仅是“科学与民主”·····	329

完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333
从时代汲取诗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342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	346
在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	354
在“纪念长沙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召开三十一年学术讨论会” 上的发言·····	358
信札中真实的梁任公·····	364
历史转型期的改革风险 ——清王朝最后十年的考察·····	369
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374
近代关于民族精神认知的当代启示·····	377
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三十年”·····	385
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	391
高校历史学科科研与教学的互动与困窘·····	394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	401
历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408
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414
缅怀导师龚书铎先生·····	421

下 编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序·····	433
《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序·····	437
《“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序·····	442
《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序·····	446
《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序·····	449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454
《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序·····	457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运动》序·····	460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派——价值观比较》序	464
《任鸿隽科学文化思想研究》序	467
《民初的媒体与政治——1912—1916 年 政党报刊与政争》序.....	472
《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研究》序	475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保护”——近代中国文物保护的制度 与实践研究（1840—1949）》序.....	478
《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序	482
《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序	485

上 编

梁启超与欧战

欧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深且远，在文化思想领域则尤甚。梁启超是幸运的，正当他决意舍政从教之时，恰赶上了这个时代的转变点。他不仅曾身居高位，得以参与决策对德宣战和对日交涉；而且有条件于战后，以私人身份出访欧洲，在继续为中国外交出力的同时，得以深入考察战后欧洲社会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从而为自己即将开始的的新的人生，汲取思想养料。

对于经历丰富而思想多变的历史人物来说，把握其人生阶段性发展的标志性节点，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其人的重要方法。20世纪20年代步入晚年的梁启超，绝非走向所谓倒退，恰恰相反，而是重新跃上一个新的思想台阶，从而令其晚年重放异彩。这里的标志性节点，便是1914—1918年的欧战。很显然，研究梁启超与欧战，是理解与把握晚年梁启超的重要切入点。梁启超的研究成果虽多，但真正取角于此者，并不多见，适逢欧战一百周年，爰作是文以就正于方家。

—

梁启超不愧为老资格的政治家和有远见的思想家，他看到了这场战争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故在1914年7月底欧战爆发后仅十天，便决心著《欧洲战役史论》。他躲避政务，借居西郊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同年底，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其时国人独著的第一本欧战史论。随后他又在报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发表有关欧战的专题性文章。梁启超强调，欧战既于世界和中国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研究这场战

争，“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其不容以隔岸观火之态出之明矣”。^①不仅如此，1915年由他主编的《时局小丛书》，包括《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日本舆论对于中国之态度》等第一辑十种，也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中华书局启事》写道：“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了然于世界事情各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②足见，梁启超从一开始便高度关注欧战和希望借此启迪国人的自觉心。

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但随着1917年初美国对德宣战并要求中国积极配合，放弃中立，采取一致的对德立场，中国是否参战便成了国会、政府和民间争论的一大议题；护国战争后本想弃政从教的梁启超，又卷入了漩涡，成了极力主张参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衷”，“吾在阁数月，无日不提此议”，“吾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③1918年年底，归国不久的胡适致书求见，也说：“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见生客。”^④梁启超确是全神贯注地为欧战问题操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最初是“德国必胜”论者，何以复转向力主对德宣战？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梁启超在《欧洲战役史论》中说：“自开战之始，吾尝昌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吾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信德之决不能败也。”说得如此决绝，其理由是，无论其政治组织之美、国民素质之高，还是其制造之精良、军队之勇武，都足以说明德国是“今世国家之模范”。除非国家主义消灭，它不可能陷于劣败之地。不仅如此，英法诸国无法望其项背，其间的博弈，无异于新旧之战，“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

① 梁启超：《欧战蠡测》，《饮冰室合集·文集》（33），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② 《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0、871页。

④ 《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①实则，时人多看到了德国的强大，但持论却有别于梁启超者，主要有二：一是强调战事难以逆料，不肯明确表态；二是认同新起的互助论，反对军国主义，故在情感上期待德国战败。1915年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说，“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②1917年蔡元培在《我之欧战观》中也说，德胜则军国主义支配世界，协约国胜则人道主义昌。“吾人既反对帝国主义，而渴望人道主义，则希望协约国之胜利也，又复何疑！”^③二者都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有失绝对化。这固然并不意味着梁启超相信帝国主义而反对人道主义，但他强调“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则明显说明，作为曾经的维新运动主角，其思想仍不脱正被时人超越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论的惯性思维。他之转向对德宣战，固然与后期德国败象显露的事实有关，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也与他在思想观念上的实现自我超越紧密相连。1918年，他答记者问说：“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于世界所不容，不久将绝其迹”，吾所以力排众议，主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④在一次讲演中又说：昔达尔文以优胜劣败为进化之原则，现已为人所弃。而德国坚持并引发大战，今终败。互助论成了人们的共识。“互助之事，最伟大者，为今次协约各国及联合国之共为人道正义自由而抵抗德国也”。^⑤所言是否确当，可不置论，但梁启超是真诚的。

当然，德国颓势既现之后，梁启超不怕别人讥讽，毅然放弃前言，转而力持对德宣战，说到底，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按他的话说，就是“其根本

①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饮冰室合集·专集》（30），第69、70页。

②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1页。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④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0、871页。

⑤ 《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

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即“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①说白了，就是要为将来能在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以维护中国权益，创造前提条件。梁启超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于欧战的主张，容有可商，但其最高准则乃在于维护国家权益，是无可疑议的。有论者认为，“梁启超遁居日本十几年，对日本总有着难舍的第二故乡之情。在美、日对中国参战所持的对立立场上，他站在日本一边而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也就很自然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全然低估了梁启超的人格。如前所述，参战问题原是美国先提出来的，时日本虽自己对德宣战，因担心美国对华影响力扩大，则是反对中国参战。但在得到英法诸国对战后自己得以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默认后，日本复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与之相反，美国为防止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又改变初衷，转而反对中国参战。这种变化，反映了美日两国在华的争夺。但因此断言，面对美日对立，梁启超坚持宣战，是出于感恩之心，站在了日本一边，却不免皮相之见。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上述论者引了梁启超致段祺瑞信中的一段话：

今日之局，能生我者新亲也，能死我者近邻也，必近邻全释其死我之心（暂不动手），然后生我者乃有所用力。项城联英之政策本不误，其误在挟英以排日。今吾新亲助我之力恐尚不及旧亲，故今虽得新亲，而依赖之程度当审慎，若令近邻窥见我有挟新亲以自重之意，恐外交上之盘根错节，方从此起。

接着评论说：“亲日而疏美之意是很明显的。可以说，力主对德宣战是梁启超重视对日关系的反映。”^② 这里的问题有二：其一，此信写于1916年8—9月间，时宣战问题尚未发生；其二，信虽涉及中美、中日关系问题，

① 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饮冰室合集·文集》（35），第7页。

② 以上均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但所言的是外交策略，与所谓“亲日”倾向，风马牛不相及。重视中日关系与“亲日”，当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而且，既以“能生我者新亲”“能死我者近邻”，相况美、日，从人情道理上看，也当是“亲美”，而非“亲日”。总之，所引材料并不能支持论者的观点。同时，美日的主张前后有变且彼此对立，梁启超的主张坚持不变而表面上与日本同，这与所谓“站在日本一边”的“亲日”，在逻辑上也并无必然的联系。梁启超说，自己主宣战，是负责任的主张：“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苟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固始终守之弗渝也。”^①道理很简单，爱国者的执着与侵略者的取巧，如何能相提并论！

事实上，梁启超本人曾义正词严地回答过这一问题。他的《中日交涉汇评》汇集了此期自己撰写的一系列有关中日交涉的文章，其中《中日时局——鄙人之言论》一文说道：由于自己在参议院就政府仅抗议日本，未能对支持日本在山东不断扩大侵略活动的英国同样提出抗议，表示质疑，要求总统回答，故日本报纸攻击自己是“亲德派”并“责我忘恩负义”“吾请日本人易地相处，为良心上之判断。吾侪立于国家之最高立法机关，当国家遇此大变，是否有发言质问当局之权利及责任？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当年日本保护本人难道不是因为他是个爱国者？若本人不是爱国者，则当年的日本保护错了；若本人是爱国者，则今日的日本攻击错了。梁启超警告日本，别指望本人会相信，“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中国虽积弱，国民却充满民族自信心，“所谓某国党某国党者，终古决不能出现于我国中”！^②看到了任公这些正义凛然的自白，人们还会相信他是“亲日派”吗？值得提出的是，当梁启超承受着国内外很大压力之时，陈独秀著文支持他。他在《对德外交》一文中说，有人怀疑梁启超假外交以夺权。别说不可能有此事，果真如此，“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

① 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饮冰室合集·文集》（35），第13页。

② 梁启超：《中日交涉汇评》，《饮冰室合集·文集》（32），第95、96页。

能总揽政权，岂不逾于北洋军人万万”！^①又说，对德宣战国会已通过，仍有人反对，一些政客和失意之伟人，无论事关人类公平正义如何，于国家利害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②陈独秀当然更不会相信梁启超主对德宣战，是出于“亲日”！

其实，只要看看任公弟子吴其昌记乃师于1927年济南惨案发生前文的一段夫子自道，此谓“亲日”云云，便涣然冰释了：

先师曰：“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民，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如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瘁残疾，肮脏邈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狄平子诗‘怜怜小妹深闺坐，短短眉弯自画成！’即咏此境况也。当时日人甚爱我助也，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松坡既行，袁氏日夜派便警逡守吾门，余买街头胶皮车夫与之易服夜逃，甫离津，袁氏已觉，杀其便警。严命其沪上逻犬捕予，期在必得，‘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上谕’已布，上连像片，较清廷尤密。予惴

① 陈独秀：《对德外交》，《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3页。

②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6页。

惴不知死在何处，但暗中如有天神护卫，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独自无聊，痴思妄想，岂真国运未绝，有天神呵护耶？则又哑然自笑。自是由津而沪而港，此疑谜终不能破。至港，日人始明目张胆助予，始恍然暗中护卫我者，非天神也，乃日本人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祖父，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然吾乃永远持‘中国不亡论’著称于世者，特我人戒备之对象，当在彼不在此。”^①

随着其后事态的发展，梁启超不仅愈益展现了自己爱国的风采，而且在事关国家成败荣辱的关键时刻，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1918年11月，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次年初举行巴黎和会，中国派出了代表出席大会。从对德宣战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核心始终是山东问题，即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反对日本借口所谓从德国手里“继承”山东的利益。1918年12月，梁启超以个人身份游欧，继续为中国的外交出力。出发前，他曾出席日代理公使的宴请，谈到山东问题，他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②斩钉截铁，立场十分鲜明。后梁启超在巴黎和会外大力制造舆论，着力点也在于此。1919年1月，他应邀在万国报界俱乐部讲演，讲的就是山东问题。其中说：“若别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公敌。”^③表示了在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绝

① 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第38页。

③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第83、84页。